

## 〈世俘〉、牆盤與牧野戰後的武王東征\*

王 旭 東\*\*

### 摘 要

古書皆言武王既克殷，遂罷兵西歸，但分析殷末周初的政局形勢可知，商邑陷落後，商王朝在東土還保留著幾乎完整的政權架構與統治力量，周人不應對此無動於衷。本文結合《逸周書》〈世俘〉、史牆盤銘文等資料看，武王在牧野之戰勝利後，策劃了一系列東征戰役。據〈世俘〉，武王首先清掃安陽周邊殘敵，隨即占領商邑東、南門戶，掌握商人東進故道，一路偏北取道聊城、平陰，一路偏南繞行古大野澤南岸，平定沿途的殷之侯田、邦伯。據史牆盤銘，武王後來又專門征討今聊城、濮陽、荷澤一線的「盧」、「彭」、「夷童（重）」，意在控制以「小東」為中心的河濟之間，隔絕商邑與「大東」的聯結。為鞏固戰果，武王又命管、蔡等人「監殷」，駐紮於安陽的東、南方向，切斷武庚與東夷族群的交往通道。武王這一系列戰事，後人已知之甚少，鮮有措意，實際上，「武王克殷」、「武王征小東」、「周公征大東」構成周人奪取天下完整的「三部曲」，展現出「先小東，後大東」的東進戰略步驟。

**關鍵詞：**世俘、牆盤、東土、武王、政治地理

---

2022年2月25日收稿，2022年8月23日修訂完成，2022年10月27日通過刊登。

\* 本文撰寫得到「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資助項目「甲骨文文地理資料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G1061）的支持。本文承陳絜先生、趙慶森先生及《漢學研究》審稿專家賜示寶貴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 作者係「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北京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 一、前言

眾所周知，牧野之戰是殷周易代的標誌，經此一役，周人正式取代商人成為天下共主。按照《史記》〈周本紀〉的敘述，周人攻進商邑後，軍事行動就告一段落了，武王祭祀上天，吊死問哀，立紂子武庚以撫殷遺，封先王之後以安舊邦，遂班師西歸，途中制定了營建洛邑的計畫。之後「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禮記》〈樂記〉說得更詳細：

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sup>1</sup>

《呂氏春秋》〈慎大覽〉、《商君書》〈賞刑〉、《淮南子》〈泰族〉、《韓詩外傳》卷三第十三章都有類似文字，殆為史遷所本。從這些記載看，周人取得牧野之戰的勝利後，似乎就偃旗息鼓，不復征戰，這既符合儒家「仁人無敵於天下」的價值觀，也實現了黃老「無為而治」的要求，因而是秦漢時最通行的看法。

然而今天我們已經能揚棄儒者、黃老學說，憑著「實事求是」的精神考察歷史。殷周易代是西土、東土集團爭奪天下的生死搏鬥，斷然不會呈現一片平和景象，更不會憑藉一場戰役的勝利完成政權的更迭。關於西周王朝之底定，前人論述集中在「武王克商」與「周公東征」，成果可謂豐碩；<sup>2</sup>但在這兩步戰略之間，即武王去世前的兩年內，周王朝的軍政大計同樣值得重視。誠然，武王末年史料可謂稀缺零碎，唯《逸周書》中的〈世俘〉、

1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 39，頁 1542。以下引用《十三經注疏》皆標註於引文後，不另註。

2 系統全面的論述參見顧頡剛《大誥校釋譯證》中的〈歷史之部——周公東征史事考證〉，最初在《文史》上陸續發表，後收入《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 10 卷下（北京：中華書局，2011）。以出土文獻為綱目編排史事的，可參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2004）；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作雒〉幾篇略成系統，但所載人、地、族、事的考證又多存疑點，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我們深入考察這段歷史。竊以為，放在殷周易代的大背景下考慮，牧野戰後周人並未四面出擊，而是將兵鋒繼續指向東方，概括說即「掌控小東，挺進大東」，周公攝政後東征，在戰略上一以貫之。準此，筆者擬抽繹出「武王東征」作為過渡階段，嘗試以〈世俘〉為線索，以出土文獻為補充，梳理武王末期的軍事活動與控禦舉措，復原周人完整的東進策略，以期加深對西周「封邦建國」政治文明的理解，不當之處，尚祈方家教正。

## 二、空間背景：牧野之戰前安陽近畿的政治地理與交通路線

自古公亶父「居岐之陽，實始翦商」以來，周人一步步向東拓展，文王平定涇渭上游，控制豫西、晉南，武王強渡黃河天塹，衝破太行山險，進入廣袤的東部平原。然而從盤庚遷殷算起，商人經營東方二百餘年，各方勢力盤根錯節，商、夷、夏犬牙交縱，即便帝辛身死，商邑淪喪，昔日的統治框架卻不會一朝隨之消亡。武王克殷後，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商人在東方的「政治遺產」。故在論述武王東征前，我們有必要將目光稍稍回溯，簡要談一下殷商末期安陽周邊的政治地理格局。

自《漢書》〈地理志〉以降，古書皆言帝辛都於朝歌（今淇縣），但現代考古發掘則表明，晚商都邑位於安陽小屯的殷墟遺址。特別是最新考古學研究顯示，殷墟文化四期晚段的絕對年代已進入周初紀年，<sup>3</sup>且殷墟遺址在第四期沒有任何廢棄、衰落或發展停滯的跡象，反而規模還在不斷擴張，<sup>4</sup>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考古工作者在淇縣附近調查發現商文化遺址二十餘處，尚未找到高等級墓葬或大型夯土基址等與「王都」地位相稱的遺跡遺物。<sup>5</sup>終晚商之世，小屯殷墟一直是商王室都邑所在，至於古人眾口

3 唐際根、汪濤，〈殷墟第四期文化年代辨微〉，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編，《三代考古（一）》（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頁178-193；李宏飛，〈殷墟文化第四期絕對年代辨微〉，收入宋鎮豪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新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318-327。

4 岳占偉，〈從考古材料看殷墟第四期的文化面貌〉，《南方文物》2020.4(2020.8): 74-81。

5 夏商周斷代工程朝歌遺址調查組、王迅，〈1998年鶴壁市、淇縣晚商遺址考古調查報

一詞地說紂都於朝歌，則可能是受了康叔封衛及「小東」政治中心南移的影響，相關問題後文還會涉及。

如果說安陽殷墟是商邑之「都」，以安陽為中心，西、北至太行山東麓，東、南至古黃河沿岸的範圍，大概就是商邑之「鄙」。《詩經》〈商頌·玄鳥〉云殷邦「景員維河」，謂其周遭有黃河為限，<sup>6</sup> 周人史官紀錄有「河竭而商亡」的傳說，<sup>7</sup> 戰國時吳起評論三代都邑地形，也講到「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sup>8</sup> 以太行山與黃河為地利天險。太行山聳立於安陽西北，古黃河「東過洛汭」後，經今浚縣宿胥口，折而東北流至今濮陽西南，再折而北上至今館陶東北，<sup>9</sup> 正好包圍了商邑的南、東兩面。前人或將這片地域比擬為商之「王畿」，從統治方式上看，商鄙內為依附於商的獨立小邦，與禮書所記郊縣鄉遂差別很大，但如考慮「幾，近也」的本義，偶爾借用「王畿」一詞來指代安陽周邊地域，亦未嘗不可，本文暫稱之為「安陽近畿」地區。

在商邑以外，商王以籠絡屬邦、設置據點、武裝巡省等方式來實現統治。自武丁起，商王朝在南土的勢力範圍急劇收縮，<sup>10</sup> 到帝辛末年，商人在豫西晉南的盟友、屬邦及軍事據點也被周人一一拔除，安陽西側的戰略縱深喪失殆盡。唯有安陽以東，商人還保持擴張的勢頭，控制著一批臣服聽命的「多伯」、「多方」，及領受職事的「多田」、「多侯」，前者有滕州的薛伯、濟陽的逢伯、青州的「小臣醜」、<sup>11</sup> 泰安的「小臣牆」等，後

告》，《華夏考古》2006.1(2006.3): 5-11。

6 「景員」可讀為「廣運」，即所謂「東西為廣，南北為運」，泛指四面界域，參清·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 1170。

7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卷 1〈周語上〉，頁 27。

8 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彙考（增補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卷 22〈魏策一〉，頁 1143。

9 古黃河的河道復原，參譚其驤，〈西漢以前的黃河下游河道〉，《譚其驤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432。

10 孫卓，《南土經略的轉折——商時期中原文化勢力從南方的消退》（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

11 「小臣醜」之「小臣」的含義舊多爭議，但從卜辭記載「小臣醜」的活動及蘇埠屯「亞

者有濟南的甌侯、曲阜的奄侯、肥城的「在林田俞」、<sup>12</sup>萊蕪的攸侯、「在義田」等。這些商王朝的侯、田、邦伯扼處東土淄、汶二水的關津要道，控制泰山南北的往來交通，在海岱地區構築起嚴密的統治網絡。

除了設置侯衛，商王還常親身到東土巡省遊獵，以威懾叛服不定的東夷土著，殷末「征人方」占卜遺存、眾多田獵卜辭俱為明證。因此，商人特別注意交通路線的控制。從商邑去往東土，主要有兩條路線：一是自安陽東出「涉河東兆」，在今濮陽北的清豐一帶渡過黃河，直行向東，在今莘縣附近渡過古濟水，即可繞行泰山南北，進入汶、淄流域。商末征「巖（陰）美方」<sup>13</sup>所走的「河東兆（清豐）—洛（聊城）<sup>14</sup>—占谷—鑄（肥城）—軻（寧陽）」（《甲骨文合集》36896<sup>15</sup> + 《甲骨文合集補編》11283<sup>16</sup>，黃）路線便是典型例證，《左傳》所見由晉、衛入齊，如衛宣公使急子如齊（桓公十六年）、「鞏之戰」晉師進兵（成公二年），均經過莘地（今山東莘縣

---

醜」墓地資料分析，「亞醜」族是晚商東土獨立性較強的族邦，「小臣」接近於榮寵的稱號。《尚書》〈君奭〉：「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其「小臣」與「侯甸」並列，大概就指「小臣醜」這樣的外服屬邦君長。

- 12 「林」殆即十祀征人方所征之「林方」故地，約在今肥城境內，參陳絜，〈卜辭雍地地望及其他〉，收入鄭州中華之源與嵩山文明研究會、河南省文物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中華之源與嵩山文明研究》第3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頁205。
- 13 關於「征巖美方」占卜遺存的研究，參董作賓，〈旬譜·七〉，《殷曆譜》下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孫亞冰，〈卜辭中所見「巖美方」考〉，收入宋鎮豪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新3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98；陳絜，〈甲骨文中的「𠄎」字及其相關問題之檢討〉，收入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青銅器與金文》第3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136。
- 14 舊說「洛」為河南或陝西之洛水，與「征巖美方」整體的東進路線顯不調諧，陳絜先生考證「洛」為《春秋》〈閔公元年〉齊地「落姑」，更為可信。又戰國時燕、齊間有要道稱為「雒路」（見《說苑》〈奉使〉）或「格道」（見《戰國策》〈秦策四〉），乃齊國濟西門戶，殆在今陽穀、聊城一帶，卜辭「洛」地若在此處，從方位、路線上看也很合適。
- 1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1982），36896號。以下引用該書簡稱《合集》並標明著錄號碼於引文後，不另註。
- 16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補編》（北京：語文出版社，1999），11283號。以下引用該書簡稱《合補》並標明著錄號碼於引文後，不另註。

北)，走的正是這條經「河東兆」進入東土的路線，後世猶有「莘道」之稱（《水經注》〈河水注〉）。二是自安陽南行，至淇縣附近南渡黃河，折而向東，取道鄧城、荷澤之間，經古大野澤南端，進抵汶水南岸的兗州、曲阜一帶，東周中原列國與魯國多循此路線交往，<sup>17</sup> 料想商周時期相差不遠，卜辭也能提供部分證據，留待後文詳述。在兩條幹道的關鍵節點上，商人不斷強化守衛力量，以保證道路暢通。

周人動輒講「紂有億兆夷人」、「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可見帝乙、帝辛依託戰略據點與交通要道經略東土卓有成效。儘管周人一戰就能攻入商邑，上述「殷邊侯田」卻不會在朝夕間全部覆滅或倒戈，武王恐怕也無法置之不理——換言之，在牧野勝利後，《禮記》〈樂記〉描繪的刀槍入庫的景象並不可信，對於商人在東方的龐大勢力，武王不能不用兵征討，還要針鋒相對地布置策略，這正是本文要探索的主題。

### 三、〈世俘〉所載牧野戰後的東征

傳世《詩經》、《尚書》文獻中，描摹牧野之戰的作品很多，敘述戰後事宜則較少，至於直接記錄戰後征伐的，唯《逸周書》收錄的〈世俘〉一篇最為具體。〈世俘〉與戰國秦漢間流傳的《尚書》〈武成〉關係密切，其珍貴的史料價值到近代才被認識、發掘，顧頡剛、趙光賢、李學勤、張懷通等學者先後作了深入的研討。<sup>18</sup> 經過前輩的不懈努力，今本〈世俘〉曆日錯亂及錯簡的問題基本得到廓清，整篇文字可分為四部分：一、一月壬辰至二月甲子，武王出兵克商；二、二月丁卯至四月乙巳，調兵繼續征伐；三、四月庚戌至乙卯，回到周廟獻俘祭祀；四、增附的「俘玉」內容。這裡我們主要關注第二部分，現依顧頡剛、趙光賢、李學勤所校定字句，

17 史念海，〈春秋時代的交通道路〉，《人文雜誌》1960.3(1960.6): 59-66。

18 顧頡剛，〈《逸周書·世俘篇》校注、寫定與評論〉，收入《文史》編輯部編，《文史》第2輯（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1-42；趙光賢，〈說《逸周書·世俘》篇并擬武王伐紂日程表〉，《歷史研究》1986.6(1986.12): 92-101；李學勤，〈〈世俘〉篇研究〉，《史學月刊》1988.2(1988.4): 3-8；張懷通，〈〈世俘〉錯簡續證〉，《中國史研究》2013.1(2013.2): 5-14。



並抽去錯簡的「辛亥」一段，遂錄其文於下：

太公望命禦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戊辰，王遂禦循自祀文王，時日王立政：呂他命伐越戲方，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侯來命伐靡集于陳，辛巳，至，告以馘俘；甲申，百弇命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庚子，陳本命伐（磨）〔磨〕，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陳本、（命）新荒蜀、（磨）〔磨〕至，告禽霍侯，俘艾（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百）〔十〕兩，告以馘俘；百韋至，告以禽宣方，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百韋命伐厲，告以馘俘。

李學勤先生指出，上述「命」、「至」、「告馘俘」的行文方式，與西周柞伯鼎銘完全一致，<sup>19</sup>足證〈世俘〉這段文字抄錄於原始資料，可信度較高。但關於用兵的方向，古今學者尚存較大爭議，本文主張「東征說」，略述理據如下：

### （一）前輩研究成果平議

〈世俘〉中征伐的國族，孔晁已不甚明瞭，清儒陳逢衡、朱右曾等始試作考證，他們大多在所謂殷代「王畿」的範圍內尋找相應地名。<sup>20</sup>現代學者中則以楊寬先生的「南征說」與李學勤先生的「返程說」影響最大。

楊寬先生主張周人繼續向南國諸侯用兵，其論述的出發點在《禮記》〈樂記〉的一段話：「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大武〉樂章是為紀念武王而作，楊先生認為「三成」、「四成」描寫了滅商後向南進軍，正對應〈世俘〉的記載。<sup>21</sup>不過對《禮記》〈樂記〉之「南」、「北」，古代經師多說為舞者的方位，如孔穎達《禮記正義》云：「三成而南者，謂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北而南反。」<sup>22</sup>孫希旦《禮記集解》云：

19 李學勤，〈從柞伯鼎銘談〈世俘〉文例〉，《江海學刊》2007.5(2007.10): 13-15。

20 參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匯校集注（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418-421、429-432。以下凡引用朱右曾等清儒觀點均出自此處，不另註。

21 楊寬，《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頁105。

22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本》），頁1542。

「〈武〉舞為六表，而東西列之……三成而南者，自西之第三表至東之第一表……四成而南國是疆者，自東之第一表至東之第二表。」<sup>23</sup> 舞者的前進方向雖然有象徵意義，卻未必能與現實地理密合，只看「始而北出」，武王始出分明是東進，「三成而南」又如何能判定是代表南征呢？王國維先生以《詩經》〈周頌·桓〉對應〈武〉之第四章，謂「綏萬邦」、「于以四方」等詩句與「四成疆南國之事相合」，<sup>24</sup> 其意不僅限於某一方向，而隱喻天下四方平定，堪稱通達之論。

釐清〈樂記〉文義，再看楊寬先生的考證，不難發現個中矛盾之處，比如以「越戲方」在河南鞏縣（今鞏義市）東南，距安陽已逾二百五十公里，戊辰受命，壬申趕到，四天的時間明顯緊迫；又以「陳」在河南淮陽，「曆」、「蜀」在禹縣附近，陳遠而曆、蜀近，卻先攻陳而後曆、蜀，用兵次序失當；最要緊的是，在鄭州以南的汝水、潁水流域，目前發現的殷墟文化期遺址寥寥無幾，<sup>25</sup> 何以到殷末周初一變而為商人侯伯集結之處？楊寬先生因「南國是疆」而提出的「南征說」，未免有求之過深之嫌。

李學勤先生早先研究〈世俘〉時提出，應以武王所在為基準，考察征伐方國的位置。他根據利簋銘「辛未，王在闡次」（《殷周金文集成》4131）<sup>26</sup> 語，及「闡即管，在鄭州」之舊說，推斷武王至遲在辛未日已抵鄭州，或南下伐陳，或回師攻衛，再西行至晉南，沿途又有征「曆」（今山西永濟）、「蜀」（「句」之訛字，句在今山西新絳）、「霍」（今山西霍縣）之舉動。換言之，〈世俘〉征伐乃沿武王返程路線展開。<sup>27</sup> 然而李先生晚年修正了「闡在鄭州」的看法，轉而依新見版方鼎銘，改訂「闡」在殷都

23 清·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1024。

24 王國維，〈周〈大武〉樂章考〉，《觀堂集林》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107。

25 楊錫璋、高煒，《中國考古學·夏商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頁320。

2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4-1994），4131號。以下引用該書簡稱《集成》並標明著錄號碼於引文後，不另註。

27 李學勤，〈〈世俘〉篇研究〉：1-6。



附近，並說明直到甲申日武王還沒離開安陽周邊。<sup>28</sup> 後說對「闌」地的考證更為合理，然則甲申下一句的庚子，武王未必會到達晉南。因此，李先生再論〈世俘〉時，已放棄「返程沿途征伐」的觀點。<sup>29</sup>

這樣看來，諸說中仍以清儒「安陽近畿」的搜求範圍更平實可信，不過，清儒考證尚顯粗疏，結合出土文獻分析，周人進兵大率先近畿，後東土，試探性地逐步東進。<sup>30</sup> 強晨在博士論文中對此已有初步論述，<sup>31</sup> 筆者謹在其基礎上，試作補充如下。

## （二）第一階段：清掃安陽周邊

竊以為前人研究最遺憾的地方，是將所有征伐混而同之，以致無法揭示周人的戰略布局。根據日辰與地點，〈世俘〉的記載可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自丁卯至甲申，主要任務是掃蕩戰場，平定安陽近畿的反抗勢力。作戰記錄包括：

### 1. 太公禦「方來」，丁卯取勝。

「方來」應該是帝辛的盟友，趕來參加商周決戰，因此說「禦」而不說「伐」，戰場估計仍在牧野附近。前人多以「方來」為「惡來」，或備一說。

### 2. 戊辰，呂他「伐越戲方」，壬申至，取勝。

今本「荒新」二字為衍文。孔晁注云：「越、戲、方，紂三邑也」，朱右曾分「越」、「戲方」為二，新近則有學者提出，「伐」、「越」連讀，同義複合，俱表「征伐」之意，頗勝前說。<sup>32</sup> 類似用法的「越」大概是兵

28 李學勤，〈試論新出現的匚方鼎和榮仲方鼎〉，《文物》2005.9(2005.9): 62。

29 李學勤，〈從柞伯鼎銘談〈世俘〉文例〉：13-15。李先生在文中說道：「我過去說當時武王在西歸途中，實際也沒有擺脫這種誤解。」

30 〈世俘〉「東征」的觀點最早由陳絜先生在授課時提出，並作了最初論證，給筆者以極大啟發，謹致謝忱。

31 強晨，「商、周兩族融合之研究」（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19），頁 174-191。

32 章寧，〈《逸周書》「呂他命伐越戲方」考——兼論「戲方」的興革〉，收入侯寧彬主編，《陝西歷史博物館論叢》第 25 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頁 12。

器「戊（鉞）」之借字，名詞動用，訓為攻擊。<sup>33</sup> 呂他攻擊的對象為「戲方」，應如朱右曾說與《左傳》〈昭公九年〉之「戲陽」有關，據杜注在魏郡內黃北，即今內黃縣西北，離安陽有五十多公里。「戲方」未見卜辭或商金文記載，大概是商王室直接控制的蕞爾小邦。

### 3. 「侯來命伐靡集于陳」

此句有兩解，孔晁注云：「靡、陳，紂二邑也」，羅泌《路史》〈國名紀〉引作「武王伐靡及陳」；朱右曾則以「靡集」為「紂黨」人名，「陳」是地名。羅琨先生已據《路史》引文，讀為「侯來命伐靡，及于陳」，並指出「及」訓為「逮」，表示「追趕上」的本義，<sup>34</sup> 類似表述正見於卜辭（釋文用寬式，下皆同）：

己亥歷貞：三族王其令追召方，及于旺。（《合集》32815，歷）

準此，「伐靡，及于陳」就是說征討「靡」一直追到「陳」地。「及」、「集」古讀俱在輯部，殆音近互作。「靡」應該也是商紂的臣屬或盟友，惜史籍失載。

「陳」，楊寬先生以為是媯姓陳國的前身，上文已有辯白；至於朱右曾所謂「《寰宇記》曰：『衛州汲縣，古陳城也。』」亦不可信。考《太平寰宇記》並無此文，朱氏蓋誤引《大清一統志》：「伍城故城，即今汲縣治，古汲郡陳城。」據《魏書》〈地形志〉，「陳城」是南北朝時汲縣附近地名，<sup>35</sup> 兩漢尚無記載，更難上溯殷周了。這裡試提出一個猜想：「陳」或可破讀為「田」，山東長清縣崮山驛曾出土成組的殷代銅器，銘文為「田父甲」、「田父辛」，<sup>36</sup> 暗示晚商「田」氏居於此處，依族地同名的一般規則推測，「田」

33 陳絜，〈「伯或征邵」與晚商沚族——兼論卜辭地名地理研究在古文字考釋中的輔助作用〉，《故宮博物院院刊》2021.4(2021.4): 7。

34 羅琨，〈從〈世俘〉探索武王伐紂日譜〉，收入《周秦文化研究》編委會編，《周秦文化研究》（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頁139。

35 據《魏書》，汲郡汲縣「太和十二年復，治汲城，有比干墓、太公廟、陳城。」見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卷106上〈地形志〉，頁2458。

36 包括田父甲卣、爵、罍、田父辛鼎，分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頁4903、8368、9205、1642。

氏居地亦稱為「田」，或許與〈世俘〉之「陳」為一地。當然此與代齊的陳（田）氏毫無關聯，只是殷周之際的地名、族名。從安陽到長清，可循前揭「征巖美方」路線的前段（從河東兆到洛）行進，里程計有三百多公里，侯來壬申受命，辛巳抵達，日行四十公里左右，貼合當時車馬的行進速度。經此一役，周人便打通了自安陽東出的通道。

#### 4. 甲申，百弇以虎賁伐衛。

大家最熟悉的「衛」在古朝歌（今河南淇縣），正是後來康叔建國的地點，不過楊寬先生認為「衛建都朝歌，牧野之戰早已被周佔有」，故主張讀「衛」如「韋」即「豕韋」，<sup>37</sup>亦有學者推演出商之衛邑與周之衛國不同的看法。<sup>38</sup>其實，只要揚棄「衛（朝歌）為商紂都城」之說，所有矛盾均可迎刃而解，「衛」實際是商邑聚落群內的具體地點，這在金文中有確鑿的記述：

王來伐商邑，誕令康侯（鄙）于衛，沚（沫）司土（疑）眾（鄙）。  
（沫司土疑簋，《集成》4059）

學界公認沫司土疑簋銘文與征武庚、伐三監及「康叔封衛」有關，其中「康侯鄙於衛」的「鄙」，一直未得到確切訓釋，筆者贊同朱鳳瀚先生「居於衛邊鄙」或董珊先生「以衛為邊鄙」的解讀，<sup>39</sup>這正可以同《逸周書》〈作雒〉「臨衛征殷」合而觀之，<sup>40</sup>殆先派康侯進駐「衛」地營建據點，再以此為基地征伐「商邑」。康叔既在「衛」經營日久，才有了後來「封衛」之舉措。回過頭看〈世俘〉，武王雖在朝歌附近的牧野戰勝商紂，但未停留於此，

37 楊寬，《西周史》，頁106。

38 此說蓋啟自鄭玄〈邶鄘衛譜〉「紂城而東為衛」，皇甫謐《帝王世紀》、顏師古《漢書注》俱從其說，近些年王震中先生又撰文申論，見氏著，〈甲骨文亳邑新探〉，《歷史研究》2004.5(2004.10): 15。

39 朱鳳瀚，〈清華簡〈繫年〉所記西周史實考〉，收入李宗焜主編《出土材料與新視野——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頁450；董珊，〈清華簡〈繫年〉所見的「衛叔封」〉，《簡帛文獻考釋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84。

40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頁22。

而是直撲安陽，兩旬後才遣禁衛「虎賁」伐衛，當天便解決了戰鬥。考周人東進，一路夾在黃河與太行山之間，至淇縣一帶始豁然開闊，故「衛」實乃「商邑」的南大門，其戰略位置之重要在兩次克商戰役中均有所顯露。

綜上，第一階段周人除了清理殷都周邊殘敵外，同時還控制住安陽東、南兩方向的門戶，切斷了「商邑」與東土之間的聯絡通道。下一步，周人即沿著第一部分介紹的商人兩條東進路線，開始清剿商王朝的殘餘勢力。

### （三）第二階段：南北兩路漸次東進

第二階段自甲子後第四旬庚子開始，周人或自安陽東出，或南下淇縣再向東，一北一南平行東進，以下謹分敘之：

#### 1. 陳本伐麇（擒霍侯）——新荒伐蜀（擒艾侯、小臣）

庚子日陳本、新荒一段最為難讀，其癥結在於，他二人的作戰目標雖不同，卻在同一條交通線上行軍，戰報也混在一起傳回，如李學勤先生所說「在一條路線上」。因此匯報的戰果實際分屬兩人，析言之，即陳本伐麇，乙巳至，擒霍侯；新荒伐蜀，抵達時間不詳，俘艾侯、<sup>41</sup> 小臣四十有六。作此區分，南線的戰略步驟就十分清晰了。

「麇」，今本訛作「磨」，盧文弨已言及《戰國策》〈秦策四〉有「割濮、磨之北」語，蓋為一地，<sup>42</sup> 程恩澤又引《水經注》〈瓠子河注〉「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孤立峻上，亭亭傑峙，謂之歷山」，考訂「磨」的具體位置在此「歷山」附近，即今鄆城、荷澤接界處。<sup>43</sup> 依此推求，「霍侯」之「霍」亦位於魯西南荷澤市境內。

「蜀」，朱右曾已檢出「泰安府泰安縣西有蜀亭」，但囿於不明文例，又自疑己說。按《春秋》〈成公二年〉記有魯國蜀地，據杜注：「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在今泰安市東南。西周穆王時的班簋銘文云：「王命毛伯更虢城公服……秉繁、蜀、巢命……王命毛公以邦豕君、徒馭、鐵人伐東域疇戎。」（《集成》4341）此時「蜀」仍是東域重鎮，需執政大臣「毛公」

41 今本作「艾侯佚」，章太炎校云：「『佚』與『侯』，形近誤贖。」其說可從，參氏著，〈逸周書世俘篇校正〉，《制言半月刊》32(1937): 2。

42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匯校集注（修訂本）》，頁430。

43 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彙考（增補本）》，頁394。

親身治理，方收「三年靜東域」之效。「艾」，潘振引《春秋》〈隱公六年〉「盟于艾」杜注「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在今萊蕪市東南。<sup>44</sup>另《左傳》〈哀公十一年〉有齊、吳戰於「艾陵」的記載，其地或在萊蕪東北。兩個「艾」地距「蜀」均不遠，或許都與晚商「艾侯」有關。至於四十餘名「小臣」，與前揭「小臣醜」、「小臣牆」等身分相同，為臣服於商又未領受「侯」、「田」職事的邦伯族長，在此一併被擒。

陳本、新荒自安陽南下，本在同一條路線上行軍，至鄆城、荷澤之間，陳本分兵擒霍侯，新荒繞過古大野澤繼續東行，溯汶水而上，直撲魯中萊蕪地區。這條路線也見於卜辭記載：

癸酉卜，在河貞：王旬亡咎。

癸未卜，在河貞：王旬亡咎。

癸巳卜，在河東北<sup>45</sup>貞：王旬亡咎。

癸卯卜，在洹〔次〕貞：王旬亡咎。

癸丑卜，在霍貞：王旬亡咎。

癸亥卜，在霍貞：王旬亡咎。

癸酉卜，在望貞：王〔旬亡〕咎。（《綴興集》92，<sup>46</sup>黃）

商王行進的路線是「河—河東北—洹—霍—望」，「洹」字不識，或是出「河東北」南下途徑的地點，後半段由「霍」到「望」恰可與〈世俘〉呼應：「霍」殆為陳本伐磨所擒「霍侯」之封地；下一句抵達之「望」，我們曾依據弁方、下弁、龍方、夷方等地點，考證其地在今新泰、萊蕪之間，<sup>47</sup>適與「蜀」、「艾」方位相合。陳本、新荒的行軍路線正是當年商王走過的道路，周人攻擊沿途的「多侯」、「小臣」，意在翦除商王朝安插的據點。

44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匯校集注（修訂本）》，頁431。

45 拓本「河」「東」二字為泐痕所掩，略顯不清，細看「河」所從負荷之人形及「東」字中部仍可辨認。

46 張宇衛，《綴興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0），92號，頁76。《綴興集》92為《甲骨文合集補編》12732（《合集》36774+36779）與《合集》36895綴合而成。

47 陳絜、王旭東，〈殷墟甲骨中的望乘與望地——兼談卜辭「虎方」之有無〉，《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6(2019.12): 2-3。

## 2. 百韋伐宣方——伐厲

庚子日同時出發的還有百韋，他受命伐「宣方」，似乎同在乙巳日抵達，擊敗敵酋並繳獲戰車，接著順勢伐「厲」，短時間內再次獲勝。這條由「宣方」到「厲」的路線，又見於東周典籍記載：

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左傳》〈哀公十年〉）<sup>48</sup>

趙鞅遵照前一年的占卜結果伐齊，進兵路線為「轅」—「高唐」—「賴」。按「轅」、「宣」古音並在元部，「宣」讀心母，雖與「轅」讀匣母有別，然與「宣」諧聲偏旁相同的「洹」、「桓」等字俱讀匣母，「轅」地漢代置為「瑗縣」，古書中正好有從「宣」得聲的「諠」、「萱」與「諼」假借的例證。<sup>49</sup>「厲」、「賴」古讀並在月部來母，文獻中更常見通假之例。故「轅」殆為「宣方」舊居，「賴」與「厲」為一地，百韋東征與趙鞅伐齊，走的是同一條路線。

以上諸地，杜預謂「祝阿縣西有轅城」（《左傳》〈哀公十年〉）、「高唐在祝阿縣西北」（《左傳》〈襄公十九年〉）、「賴，齊邑」（《左傳》〈哀公六年〉）。《水經注》〈河水注〉敘之更詳：「漯水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王莽之『東順亭』也……漯水又東北逕高唐縣故城東。」<sup>50</sup>據清儒考證，「轅」蓋在今禹城縣西南，「高唐」則在禹城縣西四十里，<sup>51</sup>至於「賴」，《續漢書》〈郡國志〉濟南郡菅縣下云「有賴亭」，<sup>52</sup>約當今濟南、章丘接界處。百韋

48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本》），卷 58，頁 2165。

49 如《詩經》〈衛風·淇奥〉「終不可諼兮」，《禮記》〈大學〉引作「終不可諠兮」，《詩經》〈衛風·伯兮〉「焉得諼草」，《釋文》云「本又作萱」，參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頁 166。

50 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145。

51 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實》，收入李勇先主編，《詩禮春秋四書爾雅地理文獻集成》第 3 冊（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頁 299。

52 晉·司馬彪撰、南朝梁劉昭注，《後漢書志》（北京：中華書局，2012），卷 22〈郡國志〉，頁 3471。以下引用該書皆同此本，標識於引文後，不另註。



此役，渡河至「河東兆」後，循古濟水而進，整體朝東北方向前行，過濟南後再折而向東。

〈世俘〉敘述的牧野戰後之征伐到此便截止了。正如前文所述，晚商王朝的統治重心在海岱地區，武王克商後繼續東征，才是符合形勢的舉措。周人的戰略布局非常清晰：先掃蕩安陽近畿，控制住由商邑東出的道路門戶；然後分南北兩路，重點經營河、濟之間的豫東魯西地區；最後試探性地攻入東土，北路至濟南以東，南路直插萊蕪。武王也沒打算在短時間內平定泰山南北的全部商、夷勢力，掌握東進通道才是此階段的根本任務。

#### 四、出土文獻的補充：史牆盤銘「逖盧豸，伐夷童」新解

〈世俘〉後面還講到：「武王遂征四方，凡懋國九十有九國。」具體數字固不可信，戰爭之密集亦可見一斑，前面討論的地名邦名，想來不會是武王東征之全部，比如《孟子》〈滕文公下〉引逸《書》：「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趙岐注云「道周武王伐紂時也」。<sup>53</sup> 明義士（James Mellon Menzies）最早提出「有攸」即卜辭所見之「攸侯」，<sup>54</sup> 李學勤先生論證攸地在萊蕪東境，<sup>55</sup> 則「攸」與「蜀」、「艾」鄰近，或許在前舉「新荒命伐蜀」時一併遭征討。此外，出土文獻中也有相應線索，比如史牆盤銘記述的武王戰功，對我們認識牧野戰後的東進策略尤有助益。

史牆盤 1976 年出土於陝西扶風莊白一號窖藏，銘文記錄的西周前段周王世系吸引了眾多學者關注探索。在講到武王時，銘文說：

訊圉武王，適征四方，達（捷）殷畯民，永不玃，狄盧豸，伐夷童。（史牆盤，《集成》10175）

53 漢·趙岐注，清焦循疏，《孟子正義》（《諸子集成》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6〈滕文公章句下〉，頁256。

54 明義士，〈表較新舊版殷虛書契前編並記所得之新材料〉，收入宋鎮豪、段志洪主編，《甲骨文獻集成》第19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頁383-384。明義士文章蒙外審專家提示，謹致謝忱。

55 李學勤，〈商代夷方的名號和地望〉，《中國史研究》2006.4(2006.11): 7。

「遙征四方，撻殷峻民」是歌頌武王克商平定天下的常見套話，下面九個字的讀法頗多，茲不俱引，筆者讚同裘錫圭先生早年的斷讀：「永不巩，狄盧兕，伐夷童」，<sup>56</sup> 林滙先生補充解釋為，「永不巩」即得到永久的大大鞏固，「狄」讀「逖」訓為「遠」，「逖盧彤，伐夷童」即「驅趕盧、彤，征伐夷、童」，說的是武王克商後新的戰功。<sup>57</sup> 若考慮「狄」與「伐」對文成辭，則「狄」讀為「剔」或「鬻」，訓為攻治或翦除，<sup>58</sup> 可能更貼合銘文語境，寬泛地講即征伐「盧彤夷童」幾個族邦。

林滙先生認為，「狄盧、彤，伐夷、童」反映了武王征四方的兩個重點方向，「夷」、「童」在東方，「盧」、「彤」則在北方，他最主要的證據是 1986 年琉璃河 1193 號大墓出土的克罍、克盃，其銘文云：「余大對乃享，命克侯于匭，使羌、貍、戲于馭（御）彤。」（《新收》1367、1368）<sup>59</sup> 是說「克」被任命為匭侯，率領「羌」、「貍」、「戲」等族抵禦「彤」的侵犯，故「盧（戲）」、「彤」應位於燕國附近、今河北北部。不過，在林先生的邏輯鏈上，存在一個小小的時間差：儘管古書各有歧異，現代學者已考證清楚，燕國的封建是在成王親政後才完成的，<sup>60</sup> 上溯武王時代，「盧」、「彤」是否已在北土？在和平年代，大範圍的移民或許罕見，然在殷周易代之際，各族邦主動或被動的遷徙十分頻繁，焉知「盧」、「彤」不是戰敗後奔逃或被驅趕到北土？清華簡〈繫年〉所載秦人西遷就是典型例證，<sup>61</sup> 我們不能因「秦先人」棲身西陲，就推測秦人世居於此，事實上他們在周公東征前仍居東土；同理，也不能因成王親政後「盧」、「彤」近

56 裘錫圭，〈史牆盤銘解釋〉，《文物》1978.3(1978.4): 26。

57 林滙，〈釋史牆盤銘中的「逖盧彤」〉，《林滙文集（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 147。

58 《詩經》〈魯頌·泮水〉：「桓桓于征，狄彼東南。」鄭《箋》：「狄當作剔，剔，治也。」《釋文》引《韓詩》作「鬻」，云「鬻，除也」。這裡「征」與「狄（剔）」亦對文通用。「狄」的訓讀承外審專家指正，謹致謝忱！

59 鍾柏生、陳昭容、黃銘崇、袁國華編，《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頁 946-947。

60 任偉，《西周封國考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 153。

61 李學勤，〈清華簡關於秦人始源的重要發現〉，《初識清華簡》（上海：中西書局，2013），頁 140-144。

於燕國，就推測武王征四方時兩國已在北土。要明確武王「狄盧、髡」的作戰方向，還需著眼於武王以前的資料。本文嘗試以甲骨卜辭中的「髡」地為線索切入探討。

### （一）甲骨文「髡」方位考

甲骨文中的「髡」常與「微」之初文「𠂔」混淆，兩字都像披長髮的人形，但如林先生所論，「髡」在「手部表現分叉的手指」，與「𠂔」及從「𠂔」的「微」有明顯區別。關於「髡」地、「髡伯」的資料，林先生文章已作介紹，如「呼取髡伯」（《合集》6987，賓）、「雀弗其獲征髡」（《合集》6986，賓）等，說明「髡」是和商王國既有和平交往又互相攻伐的一個方國或部族。不過對於「髡」的地望，林先生未從卜辭中尋得太多線索。

林先生所舉「髡」的字形，有一處出自《合集》36777：「癸丑……髡……步……」僅憑這條殘辭，當然不足以推斷「髡」地所在，但幸運的是，該版殘甲可綴入一版王步卜辭之中，拼合後的行程為：

癸丑〔卜，在〕髡〔貞：王〕步……

乙卯〔卜，在……〕貞：王〔步于〕義，<sup>62</sup>〔亡災。〕

丁巳卜，在義貞：王步于類，亡災。王又（右）田，獲狐。

己未〔卜，在〕類貞：〔王步〕于〔𠂔（易），亡〕災。

辛酉卜，在𠂔（易）貞：王遯于洵，往來亡災。

〔壬戌〕卜，在𠂔（易）〔貞：王〕步于……亡災。

……貞……次……亡〔災。〕

甲子卜，在□貞：王步于高膚，亡災。

乙丑卜，在高膚貞：王遯于膚，往來亡災。

戊辰卜，在高膚貞：王遯于，<sup>63</sup>往來亡災。

〔辛〕未卜，在高〔膚〕貞：王步于……亡災。

癸酉卜，在帛貞：王步〔于〕竅，〔亡〕災。

62 「義」字考釋參劉釗，〈釋甲骨文籍、義、蟪、敖、戕諸字〉，《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0.2(1990.3): 9-10。

63 原缺刻。

〔甲戌卜〕，在窳〔貞：〕王步〔于□〕，亡災。

〔乙〕亥卜，在□貞：王步〔于〕窳，亡災。

……卜，在窳〔貞：王〕步〔于〕望，亡災。

（《合集》36842+36837+36753+37504+36755+36754+36777+《拾遺》622<sup>64</sup>，黃）

從癸丑到乙亥的二十三天內，商王由「𠂔」地出發，經「義」、「類」、「𠂔（易）」、「高膚」、「帛」、「窳」、「𠂔」諸地，最後到達「望」。筆者曾誤「𠂔」為「𠂔」，以魯國郕邑（今山東梁山縣北）當之，遂推測整條線路是在汶水北岸溯流而上。今按，「𠂔」下一站為「義」，又在晚商金文中作族氏名（《集成》9852），方位暫不能詳考；第二站為「類」，《春秋》〈宣公十年〉「伐邾，取繹」，《公羊》經文作「類」，疑是一地兩名，殷代「類」地或在今嶧山腳下；再下一站為「𠂔」，<sup>65</sup>最新研究成果認為，甲骨文中獨立成字的「𠂔」可能是「杖」的表意初文，讀如「易」聲，並非後來截取「考」字而省成的「𠂔」，<sup>66</sup>依聲韻推求，「𠂔（易）」或與花東卜辭中的「觴」有關，為齊魯間的關隘「陽關」（《左傳》〈襄公十七年〉），在今泰安岱嶽區，<sup>67</sup>距「類（繹）」約八十公里，可在兩日內抵達；再下一站「高膚」與「膚」鄰近，陳絜先生考證「膚」為魯莒之間的「鄆」地（《春秋》〈僖公元年〉），<sup>68</sup>「高膚」可推測在新泰附近。故該版前幾處地點俱在邾、魯之間，到「𠂔（易）」、「高膚」後，商王才逐步踏入汶水上游。由此推測，此行乃從曲阜以南區域進入東土，走的是「霍——望」南線通道，起始之「𠂔」地，應在古大野澤以南、以西的範圍搜求。

64 宋鎮豪、焦智勤、孫亞冰，《殷墟甲骨拾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622 號，頁 118、348、349。

65 《甲骨文合集》拓本不清，特別是上端橫劃模糊，察早期拓本分別作「𠂔」（《前編》2.7.4）、「𠂔」（《續編》3.31.10），舊釋為「𠂔」應是可信的。

66 李春桃，〈甲骨文「𠂔」字新釋〉，收入宋鎮豪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新 10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頁 253-264。

67 陳絜，〈「伯或征邶」與晚商沚族——兼論卜辭地名地理研究在古文字考釋中的輔助作用〉，《故宮博物院院刊》：10。

68 陳絜，〈商周東土開發與象之南遷不復〉，《歷史研究》2016.5(2016.10): 10。

考慮到音近通假，竊以為「𦍋」（幽部幫母）在典籍中轉寫為「茅」（幽部明母），即周公子受封的茅國所在。《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記「周公之胤」有「茅」，杜注：「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當今巨野縣南一帶。另《左傳》〈哀公七年〉記「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云云，杜注「高平西南有茅鄉亭」，是為《續漢書》〈郡國志〉、《水經注》〈洙水注〉中提到的「茅鄉亭」、「茅鄉城」，在今魚臺縣東北，兩個「茅鄉」相距不過四五十公里，或許是邾國侵取茅國之地而置茅邑，恰如齊之莒邑、魯之莒父。我們猜測晚商「𦍋」地也在此附近，結合卜辭行進路線考慮，武王伐𦍋以及後面封建茅國，應蘊含著控制東進南線通道的戰略意圖。

以「𦍋（茅）」為基點，我們可在大野澤以西的範圍內尋找「盧」之蹤跡。有兩條線索值得注意：一是《尚書》〈禹貢〉「雷夏既澤，灇沮會同」之「沮」，「盧」、「沮」俱從「且」得聲，例得通假。按「雷澤」在漢濟陰郡成陽縣西北，匯入其中的灇（雍）、沮二水，至唐代猶存，如《元和郡縣圖志》「雷澤縣」下云：「灇水、沮水二源俱出縣西北平地，去縣十四里。」<sup>69</sup> 沮水在今鄆城縣南一帶；二是《左傳》〈哀公十一年〉、〈哀公二十五年〉之「城鉏」，「鉏」、「盧」諧聲偏旁相同，地即《續漢書》〈郡國志〉濮陽之鉏城，在今滑縣東、濮陽西南。這兩地均處在南線通道的關鍵位置上，都有可能成為武王攻擊的目標。

## （二）「夷童」續證與邢侯簋銘「重人」

對於「伐夷童」之「夷童」，學者大多認同是東土族邦，唯具體解釋不同。早年間劉翔先生曾發表〈「夷童」考〉一文，提出「童」可讀為「重」，武王所伐之「重」為金文、典籍記載的「重國」。<sup>70</sup> 竊以為是說大體可信，唯罕見學者稱引，故試為補充，權作續貂之言。

童、重古音俱在東部定母，金文中「鐘」既可從「童」，也可從「重」，便是兩字音近可通的有力證據。讀「童」為「重」，其族入周後的蹤跡亦能推尋，西周早期約成康世的邢侯簋銘文有云：

69 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296。

70 劉翔，〈「夷童」考〉，收入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歷史地理》編輯委員會編，《歷史地理》第2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頁180。

唯三月，王令榮眾內史曰：「箒邢侯服，錫臣三品：州人、重人、郭人。」（邢侯簋，《集成》4241）

「箒邢侯服」即賜予邢侯職位，周王冊命邢侯時賞賜給他「州」、「重」、「郭」三族之人作為附庸，狀如魯之「殷民六族」。<sup>71</sup> 這類分賜給諸侯的依附民有不少來自於被征服的土著舊邦，所以「重人」很可能是武王所伐之「童」。最關鍵的是，「重」之方位也能夠與武王東征的整體地理形勢相符。文獻記載的名「重」之地有三：一是《左傳》〈僖公三十一年〉臧文仲留宿之「重館」，杜注謂「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當今魚臺縣西北，此為上揭劉文所從；二是《左傳》〈襄公十七年〉之曹邑「重丘」，據《寰宇記》在古乘氏城東北、今荷澤以東，<sup>72</sup> 此「重丘」與上「重館」相距不遠，均位於大野澤西南方向；三見於《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年諸侯會於夷儀，「同盟于重丘」，此「重丘」為齊地且近於夷儀，在今聊城縣東北。<sup>73</sup> 前兩處「重館」、「重丘」與「彤」接近，地處南線起始；後一處「重丘」則位於濟西，扼守北線咽喉。

筆者傾向牆盤之「童（重）」在聊城附近，判斷的依據在於邢侯簋銘文。第一，成康之世邢國在漢襄國縣、今河北邢臺，此已為考古發掘及銅器銘文所證實，<sup>74</sup> 以常理論之，聊城之「重」距「邢」更近，從此處「賜民」的可能性更大；第二，與「重」並列之「州」、「郭」兩族的居地也能在聊城附近落實。舊說「州」在河南溫縣附近，乃受「溫縣邢丘說」影響，邢國地望既明，此說不攻自破。按「州」、「舟」古通，陳絜先生考證金文「舟夷」、「洧水」之「舟」與《左傳》〈哀公二十一年〉「舟道」之「舟」為一地，鄰近齊之陽穀，<sup>75</sup> 在聊城東南百里左右，或為「州人」故居；「郭」乃《春秋》〈莊公二十四年〉「郭公」之「郭」、《說文》所謂「齊之郭氏虛」，在

71 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頁 247。

72 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實》，頁 274。

73 同上註，頁 277。

74 李學勤，〈元氏青銅器與西周的邢國〉，《新出青銅器研究（增訂版）》（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頁 52-58。

75 陳絜，〈「梁山七器」與周代巡狩之制〉，《漢學研究》34.1(2016.3): 18-19。



聊城東北，陳槃先生早有說論之。<sup>76</sup>「州」、「重」、「郭」殆團簇於聊城為中心的魯西區域。

上揭劉文以「夷童」連讀，「童（重）」為東方土著故而稱「夷」，不失為一種合理解釋；若考慮「狄盧彭」與「伐夷童」對文成辭，「夷」、「童（重）」分為兩個族邦亦不無可能。商周時名「夷」之地不止一處，作冊畀卣銘文云「王姜使作冊畀安夷伯」（《集成》5407），唐蘭先生認為此「夷」為姜姓，即《左傳》〈桓公十六年〉「衛宣公蒸于夷姜」之「夷」，並推測姜姓夷國春秋時已歸於齊。<sup>77</sup> 這個姜姓夷國既可與衛聯姻，又歸於齊，或地處齊、衛之間，與「童（重）」的方位適相調諧，是可資參考的線索。

綜言之，武王攻擊的「盧」、「彭」原居於古大野澤西南，處東進南線；征伐之「夷童（重）」（或「夷」、「童（重）」）乃聊城附近族邦，處東進北線。此番進攻與〈世俘〉第二階段作戰類似，仍分南北兩路，只是重點在今聊城、濮陽、荷澤一帶，而未越過古濟水、大野澤進入「大東」。史牆盤銘與〈世俘〉分別記述的作戰是同時發生還是先後進行，史無明文，筆者傾向牆盤之役更晚一些，因為兩次征伐目標不同：〈世俘〉中擒獲的「霍侯」、「艾侯」等大率為殷之侯田，擁護商王統治，故克商後立即攻擊，其意在消滅殘敵，兼掌控通道；至於「彭」、「盧」、「夷童（重）」等，多半是商之屬邦，本就時叛時服，按常理未必主動作亂，但武王還是一一攻滅，其意則在占據戰略要地，特別是控制住河、濟之間的「小東」地域，構建起北起聊城、南至荷澤的弧形「隔離帶」，切割安陽與東土的聯繫。眾所周知，史牆承襲世職，充任史官，熟悉周王室典章故事，他將「逖盧、彭，伐夷童（重）」放在「撻殷峻民」之後，並數為武王最重要的功績，可見在周人貴族集團看來，「經營小東」是堪與「牧野克殷」相提並論的大事，戰略意義不容小覷。

76 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譌異（三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487-495。

77 唐蘭，〈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銘刻〉，收入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2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91。

## 五、東征戰果的鞏固與「監殷」舉措

武王在積極策劃東征的同時，也注意到對東方土著的安撫與合作。《逸周書》〈大匡〉的主體文本出於東周人附會，但開篇云：「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蔡叔（泉）〔兪〕<sup>78</sup>商之監、東隅之侯咸受賜於王，王乃旅之，以上東隅。」文辭古奧，當有所本。這裡的「管」地舊注說在鄭州，但文中既提到「東隅」也即東方諸侯，「管」還是看作前舉安陽左近的「闡」更合適，可見武王在去世前還曾親臨商邑附近，召見管叔、蔡叔、商之監及「東隅之侯」並頒行賞賜。此時周人尚未在東方分封諸侯，「東隅之侯」大抵是殷時所置東夷「多侯」。至於《尚書》〈洪範〉所說「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或許也是同時之事，都反映出武王在一系列征伐後又對殷遺勢力釋放懷柔態度。

武王恩威並施，剛柔兼濟，征服了安陽近畿與「小東」地域，逐步控制殷商王朝過去的權力中心與統治重心，取得了克商第二步戰略的成功。接下來，如何鞏固東征的勝利果實？周公東征後「封建親戚，以藩屏周」，是我們很熟悉的史實；武王未及大規模分封，他在「小東」區域實行了一種更直接的管控模式，即「監殷」。史載武王設「三監」，關於其時間、人物、疆地及「監」的內涵，聚訟已逾千年，迄今未有定論。限於篇幅，本文亦不能全面分析舊說之得失，僅就一點問題略陳管見：管、蔡二叔分別居於安陽的東、南兩面，「監殷」不僅是為了監視安陽的殷遺，更是為防範他們與東夷的聯結。

現存有關「三監」的文獻記載，年代最早且相對可信的，首推《逸周書》〈作雒〉：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既歸，（成）〔乃〕歲十二月崩鎬，殯（予）〔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九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征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

78 依孫詒讓說校改，參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匯校集注（修訂本）》，頁 361。

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里。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sup>79</sup>

孫詒讓《周書斟補》云：「推校此文，蓋監雖有三，約舉其所治之地則唯二，殷與東是也。」<sup>80</sup>竊謂此說誠得其實。武庚作為被監視的對象仍居於安陽，守護宗廟祭祀。監殷者無論是管、蔡兩人還是管、蔡、霍三人，<sup>81</sup>都分布在兩個方向：「建管叔于東」，「東」如清儒所論即指周「小東」、秦漢「東郡」，在安陽正東，是東進北線之咽喉；「建蔡叔、霍叔于殷」，觀後文「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可知，《逸周書》〈作雒〉凡「殷」、「東」對舉，「殷」均是言「衛」，如劉師培說「殷」讀為「鄆」，「鄆」與「衛」是一聲之轉，<sup>82</sup>指商邑以南的淇縣一帶，是東進南線之門戶。至於學者熟習的「邶、鄘、衛」三分，恐怕不是殷周之際實錄，殆為後世地名之流變：康叔居殷而封「衛」，是為新的政治中心，商邑故地在其北而曰「邶」，「東」以音轉寫成「鄘」，漢儒牽和「邶鄘衛」與「三監」，留下爭論千年的謎團。

79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匯校集注（修訂本）》，頁 510-520。

80 同上註，頁 511。

81 另一種思路是，監殷者不止於管、蔡、霍，還有更多。審稿專家提示清華簡〈繫年〉關於「三監」的記載與傳世文獻有異，應予注意，按〈繫年〉云：「商邑興反，殺三監而立条子耿（聖）」（簡一三），李學勤先生認為「殺三監」不是殺三叔，「所指大約是參預監管的周人官吏軍士」，說見氏作，〈清華簡〈繫年〉及有關古史問題〉，《文物》2011.3(2011.3): 72；也有部分學者認為「殺三監」就是「殺三叔」，乃傳聞異辭，不必強行解釋，如程平山，〈周初「三監」人物考〉，《文史》2020.1(2020.2): 275。試比較李先生說與《逸周書》〈大匡〉：「管叔、蔡叔紂商之監」文，我們不妨推想，武王安排的「監殷」群體可能很龐大，管、蔡二叔扼守要地是領導者，另有不少中下層貴族、武官在殷墟周邊監視，統稱為「商之監」。「三監」概念在歷史文獻中也是不斷變化的，戰國以前史料中，「管蔡」才是反叛者的代名詞，到西漢以後，「管蔡」則與「三監」澈底「合流」，〈繫年〉的內容或可看作「合流」前的另一角度的「流向」。以上猜想還需挖掘更多史料來論證，附識於此，以待方家教正。

82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匯校集注（修訂本）》，頁 524。按劉說以「殷」為「衛」，前文又有「臨衛征殷」，劉師培云：「或殷為總名，衛為城名，猶揚、越同字，揚為州名，越又專為國名也。」又或者「臨衛征殷」之「殷」泛指殷商政權，「殷」「東」對舉時則專指地名，古書中自有上下文同字而異義之例。

結合〈世俘〉、牆盤的記述看，武王先征服了「小東」區域，才創造了設立「三監」的條件；反過來，「三監」之設又是對東征戰果的有力鞏固。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建管、蔡於殷、東，除了監視安陽外，還能觀察東土的動靜，偵伺商邑殷遺與東土「侯田」的往來，關鍵時刻可直接切斷交流通道。《尚書大傳》中保留這樣一個傳說：

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于王。」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世之將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也。<sup>83</sup>

這生動的對話當然出自後人構擬，但未必毫無史實的影子。管、蔡心生叛意後，東方的殷遺勢力如奄君、薄姑等立刻勾結武庚，慫恿他作亂。從後續結果看，叛亂者如《逸周書》〈作雒〉所謂「徐、奄及熊盈」也都是東夷族群。據此反推，正是由於管、蔡二叔放棄了「監殷」職責，還反戈加入殷人陣營，安陽的武庚與山東各地的「殷邊侯田」迅速聯絡呼應，原本周人控制的東進咽喉頃刻落入敵手，武王在「小東」地域構建的「隔絕帶」瞬時粉碎，戰略形勢幾乎回到了牧野戰前的局面。

武王的「東征」與「監殷」本是相輔相成的舉措，孰料幾百年後「東征」事跡被遺忘殆盡，「監殷」的背景遂陷入重重迷霧，「監」的內涵亦不得其解。如果只看三監叛亂，武王東征似乎是失敗了，但應注意到，武王「逖虐、彭，伐夷童（重）」這一系列征伐，基本蕩平了古濟水以西的不穩定因素，待到周公東征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擊敗武庚及管、蔡後，不必再費兵卒就能一舉掌握「小東」，隨即發兵「大東」，澈底征服泰山南北的商、夷勢力，其中還是靠了武王經營「小東」的成效。

## 六、結 論

回到文章開始的問題：牧野戰後周人真的輕而易舉就建立政權了嗎？

83 清·皮錫瑞，《尚書大傳疏證》，（《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 5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5，頁 761。

顯然，根據〈世俘〉等典籍，與史牆盤等出土文獻的記述，武王自牧野戰後就開啟東征，沿循商人東進的南北兩條路線，最遠突擊到濟南與萊蕪，重心在於征服「小東」地域，以分割安陽與東土的殷遺勢力，由此奠定了管、蔡「監殷」的布局。雖然東征的具體內容——如〈世俘〉諸國族地望、「彭」、「童（重）」之方位等，是我們新考證所得，但東征的戰略方針——先鞏固小東，再挺進大東，卻是早就被揭示出來的。

1930年，傅斯年先生發表〈大東小東說〉，提出齊、魯、燕諸國初封在成周東南，周公東征開始進入「小東」，嗣後齊、魯等國才徙封「大東」。<sup>84</sup> 近半個多世紀的考古學、歷史學研究成果顯示，傅先生關於齊、魯、燕徙封的觀點恐不可靠，但他勾勒的「小東在先，大東在後」的戰略次序，與地理形勢貼合，與政局變動調諧，仍屬可信的結論。蓋武王東進伊始，乃以「小東」地區為攻伐重點，又以「監殷」鞏固征「小東」的戰果，雖然「三監之亂」使武王的布局一度岌岌可危，但周公迅速平定叛亂，繼承了武王對「小東」的控制，進一步征服「大東」，完成「薄姑商奄，吾東土也」的戰略目標。「武王克商」—「武王征小東」—「周公征大東」構成了周人奪取天下完整的「三部曲」，「武王征小東」是承上啟下的過渡步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自石器時代以來，古濟水以東的「海岱地區」就一直作為相對獨立的文化區系存在，而河濟之間的「小東」地域是中原與東土之間的緩衝與紐帶。東漢以前，對峙爭雄在東西而非南北，「小東」為自西徂東的最後一道「屏障」，天下興亡之底定，常常係此一端。近年來陸續有學者論證，在戰國後期，秦國突破太行山而置「東郡」，為統一六國奠定了重要基礎，<sup>85</sup> 及至西漢初年，呂后與文帝也通過「東郡」之設，保持控禦山東各侯國的地緣優勢。<sup>86</sup> 上溯殷周，武王、周公的「小東大東」拓殖步驟如出

84 傅斯年，〈大東小東說——兼論魯燕齊初封在成周東南後乃東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1(1930.5): 101-109。

85 孫聞博，〈東郡之置與秦滅六國——以權力結構與郡制推行為中心〉，《史學月刊》2017.9(2017.9): 27-42。

86 馬孟龍，〈東郡之置與漢初關東控制政策〉，《歷史研究》2021.4(2021.8): 4-21。





-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北魏·酈道元撰，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
-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
- 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
- 清·皮錫瑞，《尚書大傳疏證》，《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5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清光緒二十二年師伏堂刻本影印。
- 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實》，收入李勇先主編，《詩禮春秋四書爾雅地理文獻集成》第3冊，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影印。
- 清·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
- 清·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
-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 二、近人論著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78-1982 《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84-1994 《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1999 《甲骨文合集補編》，北京：語文出版社。
- 王國維 1959 《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
- 王震中 2004 〈甲骨文亳邑新探〉，《歷史研究》2004.5(2004.10): 3-23。
- 史念海 1960 〈春秋時代的交通道路〉，《人文雜誌》1960.3(1960.6): 59-66。
- 任 偉 2004 《西周封國考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朱鳳瀚 2004 《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朱鳳瀚 2012 〈清華簡〈繫年〉所記西周史實考〉，收入李宗焜主編，《出土材料與新視野——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441-460。
- 宋鎮豪、焦智勤、孫亞冰 2015 《殷墟甲骨拾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李宏飛 2015 〈殷墟文化第四期絕對年代辨微〉，收入宋鎮豪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新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318-327。
- 李春桃 2020 〈甲骨文「𠂔」字新釋〉，收入宋鎮豪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新10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253-264。

- 李學勤 1988 〈〈世俘〉篇研究〉，《史學月刊》1988.2(1988.4): 1-8。
- 李學勤 2005 〈試論新出現的斂方鼎和榮仲方鼎〉，《文物》2005.9(2005.9): 59-65、69。
- 李學勤 2006 〈商代夷方的名號和地望〉，《中國史研究》2006.4(2006.11): 3-7。
- 李學勤 2007 〈從柞伯鼎銘談〈世俘〉文例〉，《江海學刊》2007.5(2007.10): 13-15。
- 李學勤 2011 〈清華簡〈繫年〉及有關古史問題〉，《文物》2011.3(2011.3): 70-74。
- 李學勤 2013 〈清華簡關於秦人始源的重要發現〉，《初識清華簡》，上海：中西書局，頁 140-144。
- 李學勤 2016 〈元氏青銅器與西周的邢國〉，《新出青銅器研究（增訂版）》，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頁 52-58。
- 岳占偉 2020 〈從考古材料看殷墟第四期的文化面貌〉，《南方文物》2020.4(2020.8): 74-81。
- （加）明義士（James Mellon Menzies） 2001 〈表較新舊版殷虛書契前編並記所得之新材料〉，收入宋鎮豪、段志洪主編，《甲骨文獻集成》第 19 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頁 383-384。
- 林 滢 2019 〈釋史牆盤銘中的「逖虐彭」〉，《林滢文集（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47-160。
- 唐 蘭 1981 〈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銘刻〉，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 2 輯，北京：中華書局，頁 12-140。
- 唐 蘭 2016 《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唐際根、汪濤 2004 〈殷墟第四期文化年代辨微〉，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編，《三代考古（一）》，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178-193。
- 夏商周斷代工程朝歌遺址調查組、王迅 2006 〈1998 年鶴壁市、淇縣晚商遺址考古調查報告〉，《華夏考古》2006.1(2006.3): 5-11。
- 孫 卓 2019 《南土經略的轉折——商時期中原文化勢力從南方的消退》，北京：科學出版社。
- 孫亞冰 2013 〈卜辭中所見「巖美方」考〉，收入宋鎮豪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新 3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93-101。
- 孫聞博 2017 〈東郡之置與秦滅六國——以權力結構與郡制推行為中心〉，《史學月刊》2017.9(2017.9): 27-42。
- 馬孟龍 2021 〈東郡之置與漢初關東控御政策〉，《歷史研究》2021.4(2021.8): 4-21。

- 高 亨、董治安 1989 《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
- 張懷通 2013 〈〈世俘〉錯簡續證〉，《中國史研究》2013.1(2013.2): 5-14。
- 張宇衡 2020 《綴興集——甲骨綴合與校釋》，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 強 晨 2019 「商、周兩族融合之研究」，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學位論文。
- 章太炎 1937 〈逸周書世俘篇校正〉，《制言半月刊》32(1937): 1-3。
- 章 寧 2015 〈《逸周書》「呂他命伐越戲方」考——兼論「戲方」的興革〉，收入侯寧彬主編，《陝西歷史博物館論叢》第25輯，西安：三秦出版社，頁12-19。
- 陳 槃 2009 《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誤異（三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陳 絜 2016 〈「梁山七器」與周代巡狩之制〉，《漢學研究》34.1(2016.3): 1-26。
- 陳 絜 2016 〈商周東土開發與象之南遷不復〉，《歷史研究》2016.5(2016.10): 4-18。
- 陳 絜 2017 〈卜辭雍地地望及其他〉，收入鄭州中華之源與嵩山文明研究會、河南省文物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中華之源與嵩山文明研究》第3輯，北京：科學出版社，頁199-206。
- 陳 絜 2019 〈甲骨文中的「𠩺」字及其相關問題之檢討〉，收入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青銅器與金文》第3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136-149。
- 陳 絜、王旭東 2019 〈殷墟甲骨中的望乘與望地——兼談卜辭「虎方」之有無〉，《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6(2019.12): 1-6。
- 陳 絜 2021 〈「伯或征郅」與晚商沚族——兼論卜辭地名地理研究在古文字考釋中的輔助作用〉，《故宮博物院院刊》2021.4(2021.4): 4-19。
- 陳夢家 2004 《西周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
- 傅斯年 1930 〈大東小東說——兼論魯燕齊初封在成周東南後乃東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1(1930.5): 101-109。
- 程平山 2020 〈周初「三監」人物考〉，《文史》2020.1(2020.2): 269-277。
-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 2007 《逸周書匯校集注（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楊 寬 2016 《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楊錫璋、高煒 2015 《中國考古學·夏商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董 珊 2014 〈清華簡〈繫年〉所見的「衛叔封」〉，《簡帛文獻考釋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84。
- 董作賓 1992 《殷曆譜》，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裘錫圭 1978 〈史牆盤銘解釋〉，《文物》1978.3(1978.4): 25-32。
- 趙光賢 1986 〈說《逸周書·世俘》篇並擬武王伐紂日程表〉，《歷史研究》1986.6 (1986.12): 92-101。
- 劉 翔 1982 〈「夷童」考〉，收入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歷史地理》編輯委員會編，《歷史地理》第 2 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180。
- 劉 釗 1990 〈釋甲骨文𠂔、義、𧈧、敖、𠂔諸字〉，《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0. 2(1990.3): 8-13。
- 諸祖耿 2008 《戰國策集注彙考（增補本）》，南京：鳳凰出版社。
- 鍾柏生、陳昭容、黃銘崇、袁國華，《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
- 羅 琨 〈從〈世俘〉探索武王伐紂日譜〉，收入《周秦文化研究》編委會編，《周秦文化研究》，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頁 134-144。
- 譚其驤 1996 《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市：中國地圖出版社。
- 譚其驤 2015 〈西漢以前的黃河下游河道〉，《譚其驤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432。
- 顧頡剛 1963 〈《逸周書·世俘篇》校注、寫定與評論〉，收入《文史》編輯部編，《文史》第 2 輯，北京：中華書局，頁 1-42。
- 顧頡剛 2011 〈大誥校釋譯證〉，《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 10 卷下，北京：中華書局。

## **“Shifu,” the Inscription in Shi Qiang *Pan*, and King Wu of Zhou’s Eastward Campaign after the Battle of Muye**

Wang Xudong\*

###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view has been that King Wu of Zhou 周武王 withdrew from Yin back to Zongzhou after the Battle of Muye. However, when analyzing the political and geographical situ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capital of the Shang dynasty was occupied, we can know that the quondam governors and military supporters of the Shang remained in the eastern territories, forming a threat to the new regime. The text “Shifu” 世俘 (“Great Capture”) in the *Lost Book of Zhou* 逸周書 and other materials such as the inscription in Shi Qiang *pan* 史牆盤 (basin of Scribe Qiang) show that King Wu continued his campaign into the east to deal with the above threat. According to “Shifu,” King Wu first cleaned up remnants of the enemy forces surrounding Yin, then controlled the eastern and southern gateways of Yin, and finally defeated the Shang military supporters situated along the Liaocheng-Pingyin and Daye-Wen River traffic routes, which were the two main lines leading toward the east, namely the Shang dynasty. The Shi Qiang *pan* inscription also records that thereafter King Wu attacked several precarious local governors such as those of Cuo 扈, Biao 彪, and Yitong (zhong) 夷童 (重) located around present-day Liaocheng, Puyang, and Heze to control the transitional “near east” 小東 area between the Yellow River and Ji River, while simultaneously cutting off contact between the Shang adherents in Yin and the “far east” 大東 around Mount Tai. Furthermore, to consolidate the conquest, King Wu stationed Guan 管 and Cai 蔡 in the eastern and southern gateways to monitor the present Shang peoples. With the above unearthed

---

\* Wang Xudong, Postdoctoral Fellow,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Center for Unearthed Text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hand, the measures taken by and the strategic intent of the Zhou can now be better ascertained; that is, their eastward campaign moved from Yin to the “near” and “far” east step by step.

**Keywords:** “Shifu” 世俘, “Great Capture”, Shi Qiang *pan*, basin of Scribe Qiang, eastern territories, King Wu of Zhou, political geography